

強調內在矛盾對立的一面，毛匪却更進一步說，宇宙的事物，是「永遠一分爲二」的。若此，共產黨人內部鬧「派性」問題，便非變態，而是常態了。此其一。

共黨內部的鬥爭，尖銳複雜，按諸史實，既有俄共的「先進榜樣」在前，毛共自也一步一趨！如列寧派與考茨基派的鬥爭，史達林與托洛茨基派的鬥爭；黑魯曉夫對史魔的鞭屍及其派系遺孽馬林可夫，布加寧等的鬥爭，這都是內部分裂，派系鬥爭的事實。而毛匪半生的政治生涯，幾乎無日不在其黨內搞權力宗派的鬥爭，這也是事實。此其二。

在此次「文革」中，製造派性，實在就是毛澤東自己。當紅衛兵初起時，毛匪不是大力讚揚紅衛兵「革命小將」是「造反派，革命派」嗎？把劉鄧若干以次人物，批鬥對象，說是當權派，走資派。因此，有了兩派的對立，就便于組織鬥爭了。同時把黨內的老黨員、老幹部，公社中的老農人，工廠中的老工人，又加以階級的分析，歷史的清算，又分出什麼「左派」「右派」來。紅衛兵的組織裏面，又分出什麼「真革命派」和「假革命派」出來。這些無數的宗派名稱，主義區別，都是毛江這一小集團製造出來的。若要「圍剿派性」，首先就要清算毛匪製造派性的思想和罪行了。這在匪黨幹部和青年羣衆，稍有理性的人，應該看得十分清楚的。此其三。

毛匪運用辯證的說法，毀黨毀政，整幹整人。然而辯證法這一思想方法

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

鄭傳明

前言

國際關係是指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。在以前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，主要是側重於國際法和外交史的範圍。但在近五十年以來，由於交通工具的發達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增加了，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日益頻繁，故除了國家之間的法律關係和過去史實方面而外，更着重於各種動態的研究，譬如國際經濟、文化交流、民間接觸等，在在都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。

應該是中立的，毛匪知道如何運用它，其他的匪幹和羣衆，又何嘗不知道運用它，來對付毛匪陰謀詭計的變化。看匪報的自供，指出派性具體的形象面貌，許多幹部和羣衆，就是運用辯證的方法，忽左忽右，忽明忽暗，來應付毛匪的。正如列寧所說的：「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，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」。劉鄧派是打倒了，但劉鄧派的幽靈，却到處出現，不過它是換了另一個更曲折更狡猾的姿態而已。但是這種方技，是「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」的。此其四。

當前毛匪的政治形勢，是要加速地完成「大聯合」與「三結合」的，加速地建立新的「毛澤東黨」和新的基層的臨時政權機構，維持表面上形式上的統治。但派性却和毛記的黨性鬧對立，這是毛匪自感頭痛的事。因而大力「圍剿派性」，企圖在短時期內用各種方法，如軍隊的再次鎮壓，學習班中的自我批評，宣傳工具的大批判，都是必要措施。但派性是否就此消滅，根據上述論定，絕無可能。派性也者，當與毛黨共存亡。

五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脫稿

註一：見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匪新華社廣播。

註二：見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香港星島日報四版轉載。

註三：（同上）。

註四：見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九日江西人民廣播。

每一個國家通常都是以本國的安全、人民的幸福與福利做爲追求的目標，但各國在實現這項目標的過程中，難免經常涉及本國領域以外的其他國家，有時彼此合作，有時發生衝突；有時採取和平的合法手段來達到目的，有時就發動戰爭非法強求。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往往發生一種力的關係、力的競賽和力的鬥爭。

二 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

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，要想在國際社會中推行，通常運用兩種方法：一是經由外交途徑，其中包括宣傳、政治、經濟的壓力、國際法的適用等。二是利用武力使他國屈服。茲分述於次：

(一) 外交

外交的涵義可用英國沙托爵士(Sir Ernest Satow)的話來說明，他說：「外交是獨立國家政府間處理官方關係的一種情報和技巧的運用。」我們知道，情報和外交實務是不可分的，沒有情報就沒有外交。這部份的工作，通常是經由各國外交部及駐外使領館負責推行。各國駐外使領館除了執行本國的政策，保護國家的利益、僑民的福利等而外，更要幫助其本國了解世界情勢的演變。

在過去國與國之間的外交，僅是國王或統治者的私人事務，外交官不過是他私人代表，也沒有常設的外交機構或制度。近代由於國際交往的頻繁，人們對於國際社會觀念的改變，各國不僅有了常設的外交機構、人員和制度，同時外交的方式也有了變化，私人外交逐漸被民主外交所取代。而一般的外交與會議外交也共同的並存。所謂民主外交是由人民的意向來領導外交，至於會議外交，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，目前已成爲處理國際問題最常用方式。據非正式估計，每年舉行的國際會議總在六千次到一萬次以上。另外還有所謂巨頭會議的外交，如各國元首的晤談、部長級會議的舉行等皆是。

(二) 宣傳

在國際關係中，宣傳也是常用的一種工具，它可以被解釋爲是說服人們接受某種觀點或採取某種行動的企圖。通常應注意下列幾點：①造成時勢、鼓動風潮。如邱吉爾(Winston Churchill)有名的一篇演講——「血、汗、淚」(blood, sweat, tear)——因對當時英國面對的那場艱難戰爭，做了最忠實的描述，達到最高的宣傳效用。②當日標決定以後，宣傳者應用各種技巧，吸引注意。③利用人們必然的反應達到宣傳目的。

國際宣傳是推行一國對外政策所必不可少的工具。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，其宣傳機構的工作人員高達一百四十萬人，足見其對國際宣傳之重視，這是值得自由世界特別注意，並急起直追的。

(三) 政治

我們知道，國與國之間的權利鬥爭，並不一定全靠武力，政治手段的運用，亦往往能達到展現權利的目的，進而增進其本國的利益。所謂政治作戰也就是不以戰爭爲手段而達到使敵人削弱的方法，政治戰包括心理戰、組織戰、情報戰、思想戰等。

(四) 經濟

在現代國際社會中，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完全經濟獨立的，它必須與其他國家貿易，互通有無，才能維持其生存和發展。有的國家需要進口糧食，有的國家缺乏工業原料，有的國家需要技術與投資，還有的國家需要開拓國外市場，所以經濟便成爲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。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權力鬥爭，在許多方面可以解釋是爲了一個經濟問題，幾乎每個國家其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，除了確保國家安全外，其次便是增進本國的經濟利益。一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，有時足以影響世界各地的經濟，甚而可左右世界情勢。

(五) 國際法

國際法是各國在相互關係上必須遵守的慣例，也可以說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行爲法則，但國際法並不是由任何一個高於國家的權力機關所制定者。國際法包括國與國之間和平和敵對時的所有關係在內，故可分爲平時法和戰時法兩大部份。平時法規定平時國家間的權益與關係。戰時法規定交戰國與中立國間權利義務的關係。但是由於許多客觀因素的存在，國際法的規定既非十分週詳和細密，同時也因爲沒有適當的執行機構，有時亦不能達到強制制裁的作用。然而不論如何，在近代社會，國際法的適用對於消除國際糾紛，保障人類基本權益，促進國際關係，以及消弭國際糾紛上仍有其價值與成就。

(六) 戰爭

歷史的事實證明，沒有一個時代可以避免戰爭的發生。國際社會中所發生的糾紛，在經由外交、宣傳等和平途徑不能解決時，常只有訴諸戰爭。而一國內部由於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心理等因素的失調，或是地理條件的需要（如沒有適當的出海口等），也極可能引起國際戰爭。國與國之間爲了政治經濟利益的爭奪，也經常發動戰爭。此外一國爲了報復，或爲了自衛，亦往往以武力來對抗。更有時一國爲了爭取獨立自由，不得不採取戰爭的方式來

達成目的。

基於上述理由，我們知道戰爭無法避免，而戰爭所帶來的災害則是有目共睹的；例如第一、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各國不僅死傷數百萬乃至千萬人的生命，且耗費無可估計的金錢與物力，而其對個人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所發生的種種不良影響，更無從估計。因此除了極權國家，以戰爭做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唯一有效途徑外，凡是愛好民主自由的國家，非在必不得已時，絕不輕言戰爭。然而在對抗共產國家的擴張與侵略，保障人類文明的前途起見，民主國家却不能不共同團結，一致起來抵抗，否則全世界均不免為赤色逆流所毀滅。

三 改善我國國際關係的基本方針

根據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，我國國防的基本政策是：「以保衛國家安全，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」。第一百四十條又規定，我國的外交基本政策乃是：「應本獨立自主的精神，平等互惠的原則，敦睦邦交，尊重條約與聯合國憲章，以保護僑民利益，促進國際合作，提倡國際正義，確保世界和平」。

其次從 總統歷年來對外的重要聲明中，亦可看出我們中華民國要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爭取同情、改善對外關係，應該注意下列四點：

(一)團結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：總統在民國四十一年曾經對美聯社記者指出：「世界騷亂的中心是亞洲，而亞洲騷亂的中心，是中國大陸」。十多年來我們看到中共不僅在大陸上為非作歹、倒行逆施，同時對東南亞各國的滲透與顛覆工作，從未間斷。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，總統早在十七年前，就呼籲籌組亞洲反共聯盟，希望藉着亞洲太平洋地區反共國家的團結與合作，共同抵禦共黨侵略，可惜當時沒有成功，否則不僅韓戰可以避免，今天的越戰也不致如此擴大，整個遠東的反共情勢也可能較為樂觀。值得我們高興的是，前年（一九六五）六月在漢城舉行了亞太九國部長級會議，證明亞洲地區的反共國家已經清楚知道，在手共威脅之下，亞太各國的安全與整個亞洲乃至世界的安全與發展，有密切關係。不過我們知道任何一個集體機構，要真正能夠發揮實際的效力，才算成功。否則像東南亞公約組織的不能給侵略者以實際的制裁或對抗，便形同虛設，毫無意義可言。因此以亞太會為例，如果僅僅致力於亞洲各國在經濟、技術上的合作是不够的，必須使每一個會員國，在政治、軍事上為了反共的共同目標，能夠團結合作，

才能有效的打擊共匪，達到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發展和繁榮的目的。

(二)駁斥中立主義：所謂中立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一些亞非國家所採取的騎牆政策。像當時印尼的蘇卡諾，印度的尼赫魯，緬甸的宇努，埃及的納塞等。他們主張不介入冷戰，不加入軍事同盟，企圖在東西對壘的國際局勢中，兩面討好而從中取利。然而事實證明，第一、它們不僅沒有逃避掉冷戰，像印度和印尼反而成了冷戰的重要當事國。第二、它們雖然在形勢上沒有加入集體聯防的組織，保持不結盟的地位，但是實際上又接受外來的經濟和軍事援助，分別和共匪及蘇俄訂立了雙邊協定以代替多邊條約。由於它們不能真正保持中立，由於它們對國際共產主義的了解不夠，反而給共產黨以可乘之機，得以在其境內從事滲透顛覆和分化的工作，然而最後受害的却還是它們自己。從去年印尼政府的覺醒，中止對中共的邦交，足可證明中立主義的幼稚與可笑。

(三)駁斥姑息主義：近年來國際間瀰漫了姑息主義的氣氛，其中尤以最近美國境內反對越戰及兩個中國的論調，最為嚴重。我們知道，與越共談和，承認中共，讓中共進入聯合國，不僅不能挽救東南亞的危機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，反而破壞了聯合國憲章的尊嚴。共匪侵略成性為眾所週知，要想說服它改變立場，進而接近西方是絕不可能的。今天毛匪內部由於權力鬥爭所造成的混亂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，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，有效地駁斥姑息主義的謬論，爭取國際間的支持。

(四)團結全世界非共國家，共同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侵略。

另外，關於中共試爆，在國際社會所引起的恐慌，我們也可以加以運用。誰都知道其政治上的作用遠超過軍事上的價值。共匪發展核武力，擁有核武器，原是想一方面用來向核子國家進行政治勒索；另一方面向非核子國家進行恐嚇，然而不僅核武力強大的美國、蘇俄不會受毛賊粗劣核子武器的威脅和愚弄，就是大陸鄰近的中立國家，如印度、尼泊爾、錫蘭、緬甸等，也反對其核子試爆。中共的地位比試爆前更加孤立，自由世界不但不應受其愚弄，更應該把握時機，早日把它摧毀。

總之，為了爭取友誼，改善對外關係，我們可以運用前述如外交、宣傳、政治、經濟、國際法或戰爭等各種不同的方法達到目的。